

举例来说：竺可桢先生是中国物候学、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可谓一代宗师。但即使是他的那篇历史学者引用频率最高的著名论文，亦并非无懈可击，其中把竹林分布变迁作为气候变冷的重要证据就是一个可以驳议的事实判断。在他看来，温暖的气候使古时竹林能在黄河流域大量生长，气候变冷导致后来竹子分布北限向南退却，他甚至更具体地指出：“……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纬度 $1-3^{\circ}$ ，如果检查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的月平均温度及年平均温度，可以看出正月的平均温度减低 $3-5^{\circ}\text{C}$ ，年平均温度大约减低 2°C 。”^①然而竹子是喜温植物这个“常识”并不准确，因为竹子是一个庞大的植物家族，属种众多，有的种类比较耐寒故能在华北地区自然生长，个别竹种甚至自然生长在库页岛。根据竹类专家对竹子生长特性的研究和我们对古代华北环境变迁的了解，华北竹林减少一方面是由于人类长期砍伐，另一方面是环境变迁所致——但并非因为气候变冷，而是由于地表水资源渐趋匮乏。竹子笋期（春夏之交）生长迅猛，需水量很大，没有充足的水源供给就不能正常生长。遗憾的是，他的这个失误一直被不少气候史家和森林史研究者所沿袭。

具体的自然历史事实判断尚且如此，自然与社会交错的复杂历史事实判断就更须审慎而行。就前述争论而言，假如接受豪格研究小组特别是张平中团队的科学研究结论，即不仅要承认唐朝后期气候长期干旱，而且要承认其衰亡与气候干旱具有必然联系，还要承认气候在中国古代多个王朝和玛雅文明衰亡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具体事实判断，而是关于国家文明兴亡与气候波动因果关系的一种抽象性认识了！

自然科学家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他们把思想触角延伸到自然变化对人类历史影响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和技术方法，值得充分尊重和认真学习。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生态史研究特别关注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命活动的影响，但并不认为人类只是环境变化和自然灾害的消极承受者，不能过分低估一个庞大帝国和复杂文明体系对自然变化的应对能力；人与自然之间是双向作用的关系，至少从历史学的范畴来看，社会变迁不单纯是由于自然力量的推动，王朝兴衰和文明起落终究是由人类主导，不能把历史的主角——拥有文化的人类等同于其他动物。正如张德二所批评的那样：仅用一个钻孔的测量数据来揭示太平洋东西两岸人类文明的兴衰问题，把某一自然因子（如降水量）十年尺度的变化指认为一个王朝或文明崩溃的原因，未免过于简单化。环境科学家周力平清醒地指出：“朝代兴衰、更替的原因这一考古学家与史学家们一直关注的重大问题不会轻而易举地被自然科学家们解决，而是需要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对特定时段的气候变化、环境背景、政治格局、经济形态、文化基础等高度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研究。”^②过分简单化的事实判断和因果解释不但无助于揭示历史真相，而且可能重新掉进“环境决定论”的陷阱，甚至导向历史“宿命论”。

“环境破坏论”的生态史评议*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侯甬坚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国人开始重视环境保护起，我国历史上以农业为主线的开发方式及其过程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② 《周力平教授读〈Nature〉Yancheva 等和张德二等论文有感》，《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8 年第 2 期。

* 本文系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2010CB950103）项目成果。

的研究,皆是“环境破坏论”的评价,此种观点影响甚大,至今已延续30多年,成为历史学研究中亟待讨论的议题。本文尝试对其展开生态史意义上的评议,以此作为征求学界内外意见的一次机会。

一、历史上开发活动的阶段性评价

1970年代,当时世界各国有关环境保护的大量信息陆续传入中国,这些信息毫无例外地是同全球遭遇诸多生态灾难的噩耗一起传入的,迅速给予当时跟外部世界联系还非常少的国人以最初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启蒙教育和诸多启示。1972年6月,中国政府派团参加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次年8月国务院在北京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并于1974年10月25日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这是被后人称道的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环境保护机构。^①到改革开放初期,环境保护已确定为基本国策,环境问题为更大范围的更多人士所认识,敏感而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专业人士,如生态学家马世骏先生为国家提出了建立“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与生态工程的重大理论,^②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也率先倡导建立符合现代生态规律的“生态经济学”,^③他们连同许多环境保护的知名人士和积极分子,推动了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环境保护思潮和行动。

历史学领域内与环境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当属历史地理学。1979年12月18日,接受邀请参加“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学术讨论会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会上做了题为《我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的报告。^④报告一开始就强调“在我国历史时期,由于植被破坏所引起的后果真是触目惊心。特别是在西北干旱区、半干旱区,尤其是这样。因此,对现有植被进行保护,实在非常重要。所以,今后在建设‘绿色长城’的同时,也要保护好现有植被”。报告所引用的一份研究论文,即另一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撰写尚未发表的《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根据此文缩写的《黄河中游森林的变迁及其经验教训》也发表在这一年《红旗》杂志第5期,史先生的另一篇《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刊登在《生态学杂志》1982年第3期,都是当时结合实际展开历史地理论述的颇有影响的论文。

由植被破坏所揭开的中国环境变迁研究动向,从黄土高原推向全国各个地区。除植被破坏外,有关历史上的垦荒开发、草场破坏、矿山破坏、河湖围垦、地貌变化、动物减少和灭绝、气候影响等内容,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专题文章如滔滔河水,席卷而来。采用文献资料论证历史上的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成为此一时期中国环境变迁研究的基本特征,与前一个时期赞扬历史上农业开发活动的声音形成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八九十年代里,“环境破坏论”的声音越来越大,可以说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其矛头指向同时也是其最主要的学术建树,即指出了人类开发活动在地理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1996年国内问世的一部颇有代表性的论著为美籍

① 《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编委会编:《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页。

② 马世骏、王如松:《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报》1984年第4卷第1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生态经济问题研究》编辑组编:《生态经济问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 侯仁之:《我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0—121页。

华人赵冈教授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①这本书“内容简介”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生态环境今天已恶化到可怕的地步”,书中细述了中国过去两三千年来生态环境剧烈变化的内容。即便在21世纪初期,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史角度展开的专门论述,得出的看法也是中国古代为有限的人口活动和环境的平面型破坏,近代仍然是人地粮关系紧张化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历史延续,现代则为无节制的人口活动和环境的立体型破坏这样的结论。^②

进入21世纪后,虽然体现“环境破坏论”观点的论著还在发表和出版,但转变之风也在悄悄出现,这种转变首先是从对开发引发破坏的学界常态化论述现象表示怀疑开始的。这应该而且必定是历史学者的声音,不结合时代特点和社会历史实际情况进行的单纯的环境变迁研究,对历史学意味着什么?可以为历史学研究做出什么样的概括和展望?

首先应就历史给予历朝历代提出的时代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给予细致的说明和阐发;其次应考虑历代政府和民众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组织、从事生产活动的,仅仅以落实“环境破坏”的史实为研究目的,很难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再其次因历史环境影响评价属于复杂性研究课题,“环境破坏”的事实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立,需要予以证实。实际上,国内外有关环境变化领域的研究,比较中性的表达为“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③“人类社会对环境变化的各种主动和被动的反应与响应”,^④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人已经认识到,基于历史开发作用下的环境变化展现的是多方向性,除了环境恶化、退化的情形外,还有环境改善、环境修复、环境优化等内容,对此绝对不能再予以忽略。

二、何以“环境破坏论”的观点相当盛行

对我国历史上的开发活动,学界做出了大量倾向于“环境破坏论”的评价,实际上意味着学界从过去赞扬类似农业生产活动的观点转过来了,那么,这个转变过程是怎样完成的呢?“环境破坏论”的出发点是什么、立足点在哪里?产生这一论点的思想根源又在哪里?

尽管学界发表或赞同“环境破坏论”的论著较多,但要从中找出比较系统的阐述,实际上又是相当困难的。为了研究的需要和方便,笔者不得不对其进行一些尽管初步却很有必要的归纳和提炼,草拟出来供学界分析参考。

第一,良好的环境意识和保护愿望,为提出“环境破坏论”观点的基本出发点。持这一观点的作者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很有社会道义,有感于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方写出代表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述作品。他们甚至对历史上的腐败政府和官吏怀有极大的义愤,因为许多古代工程的兴建,就是在腐败习气中把事情搞糟了。

第二,现实社会里存在大量环境问题,为提出“环境破坏论”观点的一个现实出发点。近代工业在各国的发展,尤其是各种化学产品的投入使用,会带来不易处理的“三废”(废水、废渣、废气),在工业区及其周边产生环境污染,大量农药的使用则影响到相应的农业区。对现实

①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② 郭沧萍、侯东民主编:《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史》(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4、226页。本书第1版出版时间为2005年。

③ 《日本IGBP国家计划》,参见孙成权、张志强、李明主编:《全球变化研究国家(地区)计划及相关计划》,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

④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1999年11月,第40页。

中此类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的报道、检查、监管、整顿乃至影响评估,会引起论者对历史上环境问题的警觉和反思,^①从而把问题的源头追溯到过去。能将自己的专长和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从历史开发中寻找伐木垦荒、围湖造田、田地上山、矿山开采的资料,形成对现实社会可以参考的借鉴意见,便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重点。

第三,所有人类活动皆有改变自然界资源环境原貌的某种结果,这是“环境破坏论”观点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不可能不“动土”,不采用自然资源,这样势必会在自然界留下一些痕迹或某种结果,便被视之为环境遭到破坏的证据。论者习称这样的垦殖活动为“滥垦”,与之并提的还有滥伐、滥牧、滥采和滥用水资源,合称其为“三滥”(指前三种)或“五滥”。论者常用“开发活动或过程”来表述,不使用农业生产活动的表述,更容易形成、介绍和传播“环境破坏论”的观点。

第四,现实的环境问题积重难返,历史上的环境问题有其来源,“积渐式”的思想成为“环境破坏论”观点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或者一种思维方式。2000年12月,中国台湾学者刘翠溶、英国学者伊懋可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文版出版,^②扉页引用《汉书·贾谊传》传主所言“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君主“不可不察也”,^③自然而然地将一种政治上的比喻用之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判断上,获得了相当广泛的传播。事实也是这样,许多历史问题的探讨,不停地往回查,多会遇到地理上的事情,于是,史学之探讨就获得了一个地理环境上的解释路径。

第五,地球科学诸多学科探讨环境演变中人为因素的作用,是为“环境破坏论”观点获得的一种推动力。从石器时代人类开始成为参与自然演变过程的一种力量(营力)后,地理学等学科逐渐加大了对影响自然环境面貌的人类活动的研究投入。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是历史时期人的活动对地理环境所引起的变化”,^④因之在这一方面投入的力量最多,所发表的论著也最为丰富。鉴于环境变迁研究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仅使用文献资料难于证实,总是发表类似的“环境破坏论”的意见也不解决问题,目前的状态是转而与其他学科携手,采用更多的技术性方法予以推进。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开发活动本身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财富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二是必然要触动大自然的某些方面,在许多场合或暂时或长时期表现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学界据此提出的“环境破坏论”,当然是基于环境保护思想对于历史上多种开发活动的反思,在补充了环境方面的内容后,历史上的开发过程才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历史评价的环境标准也顺势提出,^⑤应该说这是历史学的一个进步。

① 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编著的《中国生态问题报告》(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初写时定名为《中国生态破坏现状报告》,其中所列水土流失面广量大、土地荒漠化速度加快、河流断流日趋严重、湖泊退化愈演愈烈、地下水位下降、森林生态功能衰退、草地资源退化、珍稀野生动植物面临灭绝威胁等事项,不少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

②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台北: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出版,2000年。

③ 《汉书》卷48《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53页。

④ 侯仁之:《我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第110—121页。

⑤ 胡戟:《论历史评价的环境标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作者阐述这一标准的内容是:环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品质,好和变好就给这段历史以肯定,坏和变坏就否定。

但是,这一观点也有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1)往往就破坏说破坏,未能从生态系统角度来展开论述。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多按照现象或现实社会的情况予以解释或发挥,置比较明显的自然过程及其原因于不顾,最后以得出环境遭到人为破坏的结果为满足;(2)作为历史学研究来说,如果总是单单就当时生存环境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来发表见解,不去做每一时期社会生活具体内容的探讨,就会置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小问题于不顾,最终不能将社会发展的需要同生存环境的状况结合起来,阐明社会发展是在一种什么情形的环境条件里进行或完成的;(3)这些局限的思想根源,还在于论者总是将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看得相当对立,判断二者彼此总是处于一个矛盾激烈的关系式之中,甚至把二者看作是一个不变的矛盾体,遇事就会起摩擦、有得失、难于协调,相互间没有进行调和的余地。在这一点上恰恰脱离了环境保护中的生态思想,表现在文献资料的选取和判断上,也是相当机械地去图解。

所以,“环境破坏论”这一观点盛行的30多年间,给学界内外带来的误识和间接影响是不少也不小的。简言之,主要是将历史上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历史价值减弱了,将劳苦大众的生存权力和相关利益忽略了(把民众正常的生产活动视之对环境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破坏”),将环境变迁研究同历史研究主要职责的结合淡忘了。因此,今天的工作就必须突破和超越“环境破坏论”的一般性认识,将研究主题确定到社会发展和环境变迁相统一的研究轨道上来。

三、基于人类诸多文明成果的生态史评议

为有效展开评议,本文尝试提出一些问题:以中国为例,历史上究竟有无环境或生态的问题?如果有,那此类环境或生态问题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按照对应朝代之疆域,如何去探讨此类问题出现的地域、延续的时段、造成的影响、最终的走向?最后,此类问题本身反映和体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为推进认识,下面做出三个方面的评议,希望能做到有的放矢,有些新意。

1.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态史观

中国生态学界确定的生态学(ecology)之本义,为研究生命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①被特别强调的是参与方面相互作用的效果,而不是单单强调参与进来的客观存在的部分,所以才取义为生态学。生态学概念和思想引入中国史学领域后,一直在寻求最符合生态学含义的自己的表达,它既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要防止接近地理的环境概念与生态系统混淆起来,所以赞同采纳生态史学之名称。^②“地理环境”是一个较早地反映地理内容客观存在的词组,而具有生态品质或质量的含义则非生态学一词不可,它对应历史学领域里的内容也只能归之于生态史学来涵盖。^③

①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生态学名词》“生态学”条,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环境是某一主体周围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如果这个主体是人,环境的含义就是以人为主体的客观存在,出自《环境生态学》教科书的这一解释就更清楚了。(参见曲向荣主编:《环境生态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② 夏明方:《导论:历史的生态学解释——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革命》,夏明方主编:《新史学》第6卷《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3页。

③ 关于生态史与环境史的关系,笔者最近的体会是,生态史不一定为环境史的同义表达(原因在生态学、环境科学那里的定义和表述原有差别),前者比之后者更难理解和掌握一些,具体探讨中有更大的难度,但这都是可以在不断追求中逐一克服的。国外一般多言环境史,国外学者对生态史的看法尚有待访求。

相对于诸多熟悉历史学的论者来说,非历史学见长的学者对于历史的审视显然要温和得多。在一位工业废物处理专家眼里,农业时代的废弃物质往往是就地处置,循环地加以利用,一般不产生环境问题,其循环链为“土—植物—动物”的农业内简单循环。^①美国资深农业专家惊叹于东亚农业生产的永续特点,称呼从事这一生产的人们为“四千年农夫”。^②制定日本 IGBP 国家计划的专家更是认为:“数千年来的农业和林业活动一直是在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发展的。随着由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发展,化肥和农业机械开始使用,现代化基础得以建立。作为一种结果,创立了现代农业和林业,但由于把土地当做经济商品,超出了现有土地使用限度。还有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日益发展的现代农业和林业活动已经超出了传统农、林业尚可支撑的发展原则。农业土地开发的极端行为和森林砍伐阻止了那种一直与自然保持协调的农业、林业发展,这种后果将导致环境的毁灭。”^③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日本学者岩佐茂才会在《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一书中评价:“20 世纪是环境破坏的世纪。”^④

当然,判断历史上(尤其是古代社会里)有无环境问题的原则或标准,是以当时的开发活动是否给自然本身、社会经济及人体健康带来明显或严重的损害为定,术有专攻的学者对此的判断可以有不同,那就应该就最重要的资料、事例和想法展开新的讨论。鉴于近代以前的传统社会与近代以来工业社会在基础设施、能源开采利用及制度运行方式上的根本区别,也就决定了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与近现代社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此亦可谓环境问题上的古今之别。学术界提出历史评价的环境标准,将好似非环境保护态度的过度干扰自然的做法称之为“环境破坏论”,其意义并不在于生存环境被破坏得很厉害了,而在于学界终于开始将全体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生存环境都纳入到只有一个的地球运行系统之中,开始了对过去历史的重新书写,^⑤而且是“把人类的生存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⑥这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态史观被确定成立的关键。

2. 在关注人类命运之中关注环境的生态品质

人民大众的历史地位在过去的史家记述和研究中,出现过或高或低的现象。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观点盛行之时,其历史地位及发挥的相应历史作用获得的评价最高,及至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所获得的评价每况愈下。在有的论述中,把落实下来的环境破坏罪名,统统指向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群,岂不知此处的人群所为、彼处的人群所做,都放在一起讨论时,这些人群就成为历史上的人民大众。缺乏就生产关系展开的详细考察也就是缺乏历史的眼光,如此将人民大众斥责为环境破坏事件或过程的执行者、环境破坏责任的承担者,属于最典型的简单化、片面性论述事例。

① 廖宗文:《工业废物的农用资源化:理论、技术和实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6 年,“表 1—1、1—3”,第 7、23 页。

② 富兰克林·H. 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年。

③ 《日本 IGBP 国家计划》,参阅孙成权、张志强、李明主编:《全球变化研究国家(地区)计划及相关计划》,第 192 页。

④ 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韩立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年,第 1—3 页。

⑤ 高国荣:《环境史及其对自然的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 年第 1 期。

⑥ 徐崇温:《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年,“丛书前言”,第 2 页。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殆无疑义的事情。斯宾诺莎《伦理学》的命题之一说“要一个人不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要他不被动地感受变化，反之，要他一切动作都可单独从他自己的本性去理解，且都以他自己为正确的原因，这是不可能的”。^① 人类在自然界讨生活，该做不该做的话题可以不去说了，只是今人如何判断古人所做事项合理与否之做法值得关注 and 讨论。诸如刀耕火种、围湖造田、垦殖山林、伐薪烧炭等事项讨论已多，紧密结合当时条件下的生产关系来进行考察，学界做的还很不够，因此不少有社会经济史专长的学者加入进来，在一定程度上才改观了那样一种局面。

回顾历史，在自然界里曾经最为享受自由天空和大地的人群，是那些茹毛饮血、风餐露宿、无拘无束的早期人类。之后，进入到国家阶段的制度管理门槛之内，人类开始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严的约束，尤其是大多数民众遭受到少数统治阶级的人身控制、经济压榨，成为帝王的私有财产，^② 其过程历经数千年，这是人类所受文明进步之累。国家作为一架管理社会的机器，既有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等体现节制性做法的时期，更有动用庞大而有效的组织体系，倾其全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超强制行为，以体现皇帝和国家的意志，对自然的触动和干扰超过以往数十数百倍。至于人民大众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义务，在封建制度下遭遇的束缚、艰难和不幸，又是史不绝书，^③ 理应予以同情。

回顾人类农业历史，距今约 10000—6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在与自然界野生动植物的长期接触中，逐渐有了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化的经验，掌握了农业和畜牧业最初的生产技巧，实现了从直接的采集、捕食活动到间接获取生活产品的社会生产行业的转变。参考美国人类学家安德鲁·谢特拉关于“次级产品革命”的研究结论，^④ 此种渐渐脱离初级食物产品、进入到生产“次级产品”阶段的进步，极大地减轻了人类对自然界野生动植物的依赖，为生物多样性的保存提供了可能，并第一次将人类自己同自然界连结成一种极为密切的互助共生关系。

回顾我国农业历史，尤其是诸多商品粮建设基地发展史，如江南太湖流域鱼米之乡、珠江三角洲河网桑基鱼塘、宁夏黄河两岸塞上江南、东北三江平原北大仓等地区，大都经历过较长的农业开发阶段，有的系直接采用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方式开垦出来的，可以说是矢志不移，历经艰辛，方修成正果。这些商品粮建设基地地处我国不同自然区域，原有的自然环境里河湖错落，水资源充足，吸引了大批人群前来垦殖，而这些人群成为生产者的同时，也获得补充自身需要的生活之资，他们摸索出合理地利用当地环境资源特点的生产方式，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大批粮食等物质财富，进而使该地成为国家和地方上相当倚重的农业地区。在许多类似的地方，人民生活有所依，富民恒产得以守，人口聚集的地方成为繁盛的城镇，良好的生存环境就包含和孕育有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生态品质。

中国的人口生存繁衍和农业历史的持续展开，必然包含着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的内容。一直习惯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思维影响着的我们，已经到了需要另辟蹊径的时候。大地伦

①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173 页。

② 1980 年 1 月，历史学家王毓铨先生写道：“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人民和土地是怎么样变成帝王的私产的，现在还不明白，还得研究。”（王毓铨：《莱芜集》附录《〈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78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农民负担史》第 1 卷《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与农民负担（公元前 221 年—公元 1840 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年。

④ 易华：《谢特拉：次级产品革命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245 期，2011 年 12 月 19 日。

理学涉及的社会阶层有哪些?何处才有民众宁静的乡村生活?如何珍视而不是忽视民众的利益诉求?一方富民为了自己的长久利益,如何在已有的土地上与农民共处?富民们的道德操守如何体现?过去的开发史该怎样进行完整的评价?这些是当代学者为过去的人民大众说话的地方,也只有通过“环境破坏论”观点遗留下的难行路段,生态伦理学才能进入史学的视阈并发达起来。

3. 在各类生态系统中细化研究过程

作为一名环境伦理学家,美国的罗尔斯顿教授竟然将生态系统学说运用得得心应手,很出乎人之意料。他在“生态系统中的伦理学”小节里论述:“在大自然中,人们所要赞赏的是:一个生态系统,一个多产的地球,一个创生万物的生机勃勃的系统,在其中(只从生物学而非文化的角度考虑),个体虽然也繁荣兴旺,但它们也可以被牺牲掉,以致它们的快乐和痛苦显得无足轻重;个体的福利是重要的,但在引人入胜的自然史中却只是过眼烟云。从个体的角度看,自然中只有暴力、斗争和死亡;但从系统的角度看,自然中却存在着和谐、相互依存和延绵不绝的生命。”^①生态系统之安危及其重要性,在这里被阐述得毕露无遗。

已经很经典的曾经从属于生物学学科的生态学教科书,最主要的内容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生态系统三个部分,^②这些是生态学课程的基础。在生态史领域内实际上也是要首先学习这些基本概念和分类经验,再根据人类社会的材料和特点加以多方面的运用。

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种基本属性的地域性,在生态系统中也是最为常见和常用的研究视角,可以称之为“地域生态系统”。以我国地貌类型为例,平地(分为低平原、高平原、沙地、陆水面四类)占到全国陆地总面积的34%,山地、高原、丘陵分别占到51.9%、2.4%、11.7%,意即海拔高度在200米以上的又不太平整的部分,^③占到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大部。譬如这其中的山地生态系统、平原生态系统既可以分开,也可以在一个独立的流域内,建立起流域生态系统来开展研究。

着眼于流域的工作早就做起来了,历史地理学家王守春先生还就此做过总结归纳,他说:“历史时期人文要素的变化与河流演变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现在比较流行的模式是:历史时期人类活动使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导致生态平衡失调→水土流失加剧→河流含沙量增加→河流改道变得频繁。对于这一模式现在虽然在原则上不存在分歧,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则存在不同认识。”^④这是系统论引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领域的一个典型例子,原有的森林、土壤、河流地貌等要素,在人文因素作用下(指砍伐森林),通过泥沙物质的组分变化和运动,竟然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研究判断堆积在下游河床里的泥沙物质,成为河道改道现象凸现的根源。

这个模式产生的一个重要提示,就是生态系统内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森林、土壤、河流地貌这些要素可以分别以自己为主,构成林灌草组成的植被种群乃至群落系统、加入了生物因素和水分状态的土壤系统以及由大小支流组成的流域水文系统,在营养、水分等方面它们彼此支援,或相互争夺,呈现不规则的交叉分布态势,又统统属于整个流域生态系统。在考虑增加气候、动物、人类等因素的情况下,这个生态系统的交织情形就更为丰富多彩了。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过去环境状况详略不一,对自然要素一般都是分散而零星的记述,就

①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类对大自然的义务》,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06—307页。

② H. 雷默特:《生态学》,庄吉珊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③ 刘明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0年,“附录”,第245页。

④ 王守春:《论历史流域系统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

某一地区、某条河流、某种树木、某种动物、某种灾情的记述材料，可以进行汇集性质的研究，根据个体的品质和数量得出一些看法，更需要提倡的是就研究对象的群落或种群生态状况、地域性的生态系统状况进行研究，才能了解到“环境决定论”的适用范围和有限性，进而对研究题目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相对于在山地展开的农业开发活动，历史上对平原地区所做的开发值得给予较多的肯定，这是由山地或平原的生态系统性质决定的。即便是低山和丘陵地区，海拔高度也在 500—1000 米和 500 米以下，适合于森林生长和放养牲畜，以及各种地方性物产的经营，却最担心进行耕垦。山地作为大小河流的发源地，需要严加保护，禁止开垦，这样既保护了水源，又减去了因耕垦引发水土流失现象及其他方面的影响，方才保有山青水绿的宜人景象。可是，客观上我国不少山地分布有厚薄不等的土层，历史上因封建压榨和人口压力出现的贫民上山开垦活动越来越多，终而形成广大的山区农业社会，也就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甚至影响到山地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美国环境史专家麦克尼尔教授论文称其为“生态弹性”^①），引发了老一辈农业历史专家的深深担忧。^② 故此，有学者提出，历史上许多贫民上山垦荒诚为事不得已，现今国家怀有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对处于江河上游地区的农田布局系统，应结合生态原则和环境条件，予以重新论证，做出必要的调整，从长远利益上谋划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③

四、结语：在实践中推出中国学者的生态史学作品

接续 1949 年前后对历史上农业开发活动的赞扬性评价之后，进入 70 年代，充满环境意识、颇有新意的“环境破坏论”观点出现了，这预示着环境保护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出于激昂而冷静的社会责任，学者们由现实中的环境问题进入到对历史上涉嫌环境破坏行为的不满和探讨了。进入 21 世纪以来，则出现了质疑此论并希冀全面考察环境问题的呼声，可以感觉到生态史学的明显进步已经在寻求更新的表达了。对此笔者倾向于采用“生态影响论”来做一表达。

对于“环境破坏论”观点及其作品，长期以来读者们有一种不好说、又说不好的感觉，因为在表象上此论大方向是配合国家的环境保护事业的，所以不好说；此论构成呈现的多边关系和专业内容，致使有关驳论做起来有相当的难度，所以不大说得好。据实而言，从 70 年代国外的环境史、生态史观念及有关论著渐次传入中国后，中国史学就面临着一种特别的压力。譬如英国环境史学者伊懋可所说，“1993 年，我在《东亚史》杂志上发表了 my 第一篇重要的环境史文章《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从古到今的中国环境》。我有意起了这么一个容易引起争议和似是而非的题目。隐藏其后的想法是，我认为在环境主义者和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中有一些重要的真理；从广义来讲，我现在仍坚持这个观点。”^④ 伊懋可撰写的《大象的退却：从环境角度看

① 麦克尼尔：《由世界透视中国环境史》，刘翠溶译，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册），台北：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出版，1990 年，第 39—66 页。

② 王毓瑚：《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王广阳、王京阳等编：《王毓瑚论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年，第 310—341 页；林蒲田：《中国古代土壤分类和土地利用》，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07 页。

③ 侯甬坚：《梯田的诞生为何属于过去的南方山地？》，杨伟兵主编：《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年，第 17—36 页。

④ 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 年第 1 期，第 124—137 页。

中国历史》出版有年，中译本也快出版，但迄今还未见出现具有迎战性的争论，尽管拉德卡教授已经说过伊懋可的断言是“无法证明”的。^①

中国历史学刚刚进入到举国树立环境保护思想和行为规范的新时期，所提出的“环境破坏论”观点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以资源环境为基础，揭示了历史上所有开发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管理下，必然存在着属于草创和积累阶段所不可避免的各种负面影响，这在历史地理学、环境变迁等领域具有一定的促进学科发展的作用。但是，对于人类历史上开发活动的评价绝不能以此为满足，对历史进行全面而负责任的评价，对学科发展的大力促进，需要的是锐意进取的行动，不断超越的思想。

目前正在成长中的环境史或生态史学的一大功能，就是把大自然从过去历史学者看作演出历史活剧的舞台位置，正式地提到历史中间来，使其成为历史活剧演出中的重要角色，把握住从“舞台”转为“主要角色”的这一变化，并给予细致完整地阐述说明，即为环境史或生态史学的新使命。

对于广大的积极地从事生态史研究或思考的人们来说，学术界已有一批相当优秀的生态史专著可供观摩学习，^② 其共同特点是在树立专业方向、尽力挖掘史料的同时，又在自觉熟悉自然界和生态学，并运用生态学思想来解读中国生态史上的问题，据实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中国生态史的研究意义既不限于历史上的中国，也不限于今日中国的范围，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全面评价过去，所获得的对于生态文明演进历史部分的最基本认识，就有助于各项工作的展开和推进。寄希望于我国学术界逐步提出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又符合生态学评价原则的历史生态评价体系，并不断推出中国学者有影响的生态史研究作品。

从征服自然到保护荒野：环境史视野下的美国现代化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付成双

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美国自殖民开拓到大工业崛起的现代化历程可以说是几千年来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它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天翻地覆的环境变迁，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美国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征服自然而又遭到自然疯狂报复的灾难史。所幸的是美国社会从现代化所引发的环境灾难中幡然醒悟，逐渐走上了环境保护的道路。因此，利用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对美国的现代化经历进行探讨，不仅可以正确评价和认识它的得失成败，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① 伊懋可论文系发表在美国《东亚史》1993年第6期，第39—53页。

② 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王国豫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页。不过此书将Mark Elvin译作马克·埃尔文（即伊懋可），将刘翠洛译成了刘崔荣（第385页注47）。

② 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